

朋友们说,陈能宽的好学可能与他的名字有关,宽阔,所以海纳百川,更有人为他写下这样一副藏头联:能容天下事,宽待天下人。

## 陈能宽:诗词情怀写豪迈

■本报记者 郝俊

在“两弹一星”的功勋册上,有这样一位特别的人物,在长达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隐姓埋名不为人知。旁人以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受命参与原子弹研制中最为关键的“爆轰物理试验”之时,他却从未接触过炸药,甚至连雷管都不知为何物。然而,他却不辱使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攻克了世界级的技术难题。

“东方巨响,大漠苍茫,天似蘑菇腾地长,人半春雷鼓掌。”在科学家中,他又有难得的诗词情怀。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

### “灵台无计逃神矢”

1923年,陈能宽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山村,青少年岁月正逢民族危亡之时,心中便早早埋下“知识报国”的宏愿。

战火硝烟中,这位热血少年拼命学习。初中毕业时,陈能宽以最高总分获得奖学金,考取由长沙内迁至沅陵的雅礼中学。1942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矿冶系。

抗战胜利,陈能宽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是到刚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的天津炼钢厂做分析员。然而,看到工厂不能冒烟的烟囱,面对战后一片萧条的工业现状,陈能宽黯然神伤。

得到留学考试恢复的消息,陈能宽与大学时结识、相爱的妻子毅然决定报考,翌年,共赴美国深造。

仅用了3年时间,陈能宽便先后拿到了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准备学成回国之时,中国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与当时众多留美学生一样,陈能宽一家无法回到祖国的怀抱。

被迫留在美国,陈能宽于1950年接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聘书,在那里进行金属物理和物理冶金基础研究。1954年,他又受固体物理学家C. Zener博士的邀请,前往当时著名的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担任研究员。

在美国工作的几年间,陈能宽很快成长为颇有成就的年轻科学家。但夫妻两人的内心,却始终深埋着一个多年的愿望——重返祖国。1955年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交换平民及留学生”协议,陈能宽一家人看到了希望。

“是现在走,还是再等等?”望着妻子怀中仅有八个月大的小儿子,陈能宽有些拿不定主意。

“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终于等来这一天,现在不走还等到何时?”心灵相通,妻子明白陈能宽在担心什么,便对他说:“孩子小不是问题,我们

陈能宽 1923年5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著名金属物理学家。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学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先后任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研究员、中科院金属所研究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

我国原子弹、氢弹主要的研究者之一,领导和组织爆轰物理、特殊材料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多次在技术上参与领导和组织了国家核试验,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立下功勋。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出国时留在家的宝贝女儿也正好八个月,现在再带回一个八个月的儿子,多有意思呀。”

陈能宽心中再无犹疑,携妻儿踏上归国之旅。1955年11月25日,全家人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从旧金山经檀香山、日本、菲律宾、香港,12月16日最终抵达深圳。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美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这么好,你非走不可吗?新中国那样穷困!”美国的同事、朋友对陈能宽急于回国很不理解。

“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理由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啊。”陈能宽没有忘记,自己年少时曾许下“知识报国”的那个宏愿。

### “甘献年华逐紫烟”

回国后,陈能宽与众多漂泊异乡多年、终于踏上故土的归国学者一起,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欢迎:“你们这么年轻,回来给祖国做大事太好了!”

陈能宽永远无法忘记,他骑着自己从海外带



回国的自行车,第一天兴冲冲地前往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上班时,立刻感受到的那种幸福——“给自己做事的幸福”。

沉浸在这种特殊幸福感中的陈能宽无法意料,他的人生之路将很快迎来一次重大转折。1960年夏天,陈能宽接到一纸调令,让他前往当时的二机部报到。

“陈能宽同志,调你到二机部九院,是想请你参加一项重要的国家机密工作,我们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我们想让你负责爆轰物理工作……”这是李觉将军与钱三强、朱光亚等专家同他首次会面时的一席话,多年后仍记忆犹新。“噢,是不是让我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你们是不是调错了人?我是搞金属物理的,我搞过单晶体,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啊!”陈能宽猜到了“新产品”的秘密,但仍有些不明所以。

“调你来没有错。我们中国人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人家说我们几十年也休想把原子弹造出来,我们应当有志气。”

事实上,内爆法的可行性论证、内爆装置的设计试验对原子弹研制成功至关重要,是当时亟待破解的难题。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使命。因为是机密任务,

陈能宽不知该如何向妻子解释自己将肩负的责任,他只是说:“如果组织让我去一个你找不到,我也不能跟你联系的地方工作,你会理解吗?”

妻子有些惊讶地看着他,泪水在眼里慢慢涌起,说:“如果是组织需要,我没有意见。”

深夜,陈能宽难以入眠,喜欢用诗词抒发内心情感的他,拿起笔又放下。他不能说,不能写,这是组织的原则。他知道,为了一项神圣而艰巨的使命,他将从此隐姓埋名。

北京远郊的一片古长城下,陈能宽率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攻关队伍,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开始“土法上马”,向世界最尖端的技术发起挑战,“帐篷里面一口铝锅,拿它把炸药熬化了,再做成满足实验条件的爆炸物。”

一次次地改变配方,一次次地试爆,白天试验,夜间分析、处理数据,数不清多少个不眠之夜,陈能宽带领的队伍,终于“摸清了炸药的脾气”,在化工技术、聚合设计技术、增压技术、材料状态方程、实验测试技术等方面都取得重大突破。

1962年初,为了更快拿出合乎标准的“新产品”,北京古长城脚下的试验场已不能满足要求,他们远征至青藏高原的“金银滩”草原。

西部草原的辽阔与壮美,试验场中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此情此景,让陈能宽难抑胸中的盎然诗意,他写道:“八百年前陆放翁,一生但愿九州同。华章夜读精神爽,万里西行意气浓。”

然而,自他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对于家中妻子而言,陈能宽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信箱号码,她从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身处何方。几年里,陈能宽从一个信箱“走”到另一个信箱,带着梦想和诗情,也带着雷管和炸药。

1963年夏,陈能宽又随张爱萍将军转战至新疆。茫茫戈壁滩,自然环境更为恶劣,这里的“苦水”让他们这些“外来人”饱受腹泻之苦,为不影响工作,他们又拼命以大蒜“解毒”。

1964年6月6日,又是一个陈能宽难以忘记的日子。这天,我国自己研制的原子弹将在这片戈壁滩上进行最后一次全尺寸的爆炸模拟“演练”。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科学家依靠自己的智慧,最终突破了原子弹研制的难关,最终试验指日可待。

另一边,罗布泊深处的核试验场工程已万事俱备,陈能宽赶赴大漠,口袋里揣着自己刚刚一挥而就的七律:“腐恶瘟神将我欺,群英愤集攻尖题。一呼百应通南北,驷马奔腾破钟奇。浓雾硝烟生幕帐,千波万顷聚毫厘。默然塞外新烽火,且待春雷贯东西。”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一声巨响,蘑菇云拔地而起。

追忆往昔,陈能宽写下这样的诗句缅怀那段

不平凡的历史:“不辞沉默铸金甲,甘献年华逐紫烟。心事浩茫终不悔,春雷作伴国尊严。”

1982年,陈能宽领导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获得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6年,他同邓稼先一起,作为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领奖代表,接受国家的最高奖励。

### “长岛人歌动地诗”

陈能宽一生喜好格律诗词,他与彭桓武院士在晚年时期的“文字之交”亦成为一段佳话。

两人相识于上世纪60年代,陈能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时,彭桓武时任副所长。“他是长者,也是我的领导。我把他当老师,而他可不把自己当老师。”陈能宽回忆,尽管彭桓武比他大近10岁,但始终叫他“老陈”。而陈能宽则称彭桓武为“彭公”,大家都这么叫他。

同为“两弹一星”元勋,一个搞试验,一个搞理论,为着共同的科学理想和科学目标,并肩奋斗,开始了一生的友谊。

常年的相处中,两人无话不谈,从科学到诗词,不时也会拉拉家常。“我们在一起从来不会冷场,都是抢着说话。”陈能宽对二人相处的往昔历历在目。上世纪90年代,两位老院士开始“文字之交”,共同品玩诗词之美。

氢弹试验成功30周年纪念茶话会上,陈能宽曾即兴撰写一副对联,上联写到:“回顾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因对自己下联不够满意,他倡议同仁同事给出精妙下联。

“俯瞰洞庭湖内外,乾坤日夜浮;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这是彭桓武应征给出的下联。

对此下联,陈能宽啧啧称奇:“简直绝对。我在上联中用了岳飞的诗句,他在下联中用了毛泽东的词,不仅形式工整,内涵也很深奥。”他还解释说,彭桓武给出的下联用了假借,洞庭湖泛指全国,而长岛人泛指中华儿女。

陈能宽善书法,喜诗词,更是把学习当成最大的享受。他常年保持着一个小习惯:凡是他认为新颖的、有用的观点或词句,都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凡是一时读不懂或认不准的,都要记述下来,直至读懂弄通为止。

有一次,他在海南岛的一块巨石上看到用行草书就的一首诗,其中有几个字认不出来,遂用相机把整幅字都照了下来,返京后,他仔细对着行草字典辨认,向书法家请教,终于“胜利应对挑战”。

朋友们说,陈能宽的好学可能与他的名字有关,宽阔,所以海纳百川,更有人为他写下这样一副藏头联:能容天下事,宽待天下人。

梅贻琦以一个平衡者的身份维持着政治与教育间的微妙关系,姿态决绝而又坚定。

## 永远的校长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晶晶



梅贻琦 (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出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他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



1948年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新年里到梅贻琦校长住所祝贺的学生代表与梅贻琦(前排右三)、梅夫人(前排右四)合影。

随后清华学生会发表了五条“清华人选标准”:无党派色彩;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确实能发展清华;声望素著。几乎一年时间里,校长位无人兼任。

经过再三考查,正在美国担任清华留学生监督一职的梅贻琦进入名单。1931年,他正式归国担任清华校长。“校长风波”之后的清华校园迫切需要一位能够安定人心的领航者,梅贻琦校长就会简单地说一句:“吾从众。”

他的就职演说朴素简洁,没有什么鼓舞人心的激昂口号。他说:“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这次演说中,他将孟子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引申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治校理念。

蒋复璁评价梅贻琦说:“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梅贻琦治校有一句话叫做“吾从众”,他说校长的任务就是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关系学校要务决策必举办教授评议会,只要提出的意见建议有理有据,对教学工作、学术研究有所裨益,梅贻琦校长就会简单地说一句:“吾从众。”

时任清华文学院教授的朱自清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清华的民主作风》,说自己在清华“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每个人都有权力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褒扬梅贻琦使得清华发展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

抗日战争前的六年是清华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当时在清华执教的有吴晗、刘文典、钱锺书、闻一多、华罗庚等,他们不仅在教育上竭

尽心力,更是在学生的思想启蒙上下足功夫。而这些大师不约而同选择清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缘于梅贻琦营造出的民主自由氛围。

但梅贻琦的“从众”并非毫无主见、随波逐流,面对学生的慷慨激昂,他也曾与之发生冲突。

1933年1月6日,清华学生自治会向他提出缓考,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日方态度未明,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心有避无可避,忧心忡忡,不可终日”。梅贻琦断然拒绝,回绝说:“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同时学校发出《告同学书》:“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假如你们真去拼命,我们极端赞赏你们不读书。假如你们担任了后方的切实工作,我们绝不反对你们告假。且平心静气的、忠

实的想一想:有,不必说;没有,你们就做你们每天做的事,绝对不应该少做、不做……我们不忍看你们的行动趋于极端,更不忍社会对于清华学生失了期望,所以我们用最诚恳的态度尽一忠言,而且这忠言也许就是最后。”

清华美,美于自由,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各界有多少个党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党派;中国学界有多少个流派,清华师生中就有多少个流派。这种思想和学术自由氛围的养成,梅贻琦功不可没。

对于学生参与政治,他同样有自己的见解。在1932年的新生致辞中,梅贻琦写道:“只有热心是不能于国家有真正补助的。诸君到学校来正是从学问里研究拯救国家的方法,同时使个人受一种专门服务的训练……吾们要解决的中国的大问题,并不是一两月或是一两年的事,虽然是急难当前,吾们青年人还是要安心耐性,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探讨。”

梅贻琦不鼓励学生在学习阶段参与政治,但他给予师生言论自由的权利,并尽己所能地保护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军警夜闯清华逮捕学生。他们要求梅贻琦交出学生宿舍名单,对号抓人。情急之下梅贻琦将去年的名单拿了出来。清华那夜全校熄灯,几乎全部人去楼空,军警们只得胡乱抓人交差。

后来梅贻琦出面保释了所有被捕同学,但同时向师生表明自己是在“维护学术上的独立”。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在讲台上多有激烈言论,他也从未干涉。

梅贻琦对于政治态度始终暧昧不明,并不忠于某党某国,而是单纯追求学术独立及思想自由。他以一个平衡者的身份维持着政治与教育间的微妙关系,姿态决绝而又坚定。

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至今仍然坚持梅贻琦建校时的办学理念:专家教授主导,遵从规律治校,不扩招、不合并、不跨域。他将自己的墓穴选在了新竹校园的“十八尖山”,身在新竹,遥望北京——他用一生来守望水木清华。